



徐特立的读书人生

□ 叶松



和议论,而是按照设想的计划逐步落实。他不再为花钱买书而犹豫,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,如《十三经注疏》《读史方輿记要》《御批资治通鉴》等,他都买了回来,开始有计划、有目的地阅读。遇到疑难问题,他就自己找参考资料去摸索和解决。

徐特立白天教书,夜晚读书。他充分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来学习,就连走路、吃饭、睡觉也不忘学习。同时,他认为不切实际地贪多,既不能理解、消化,又不能记忆,读了等于不读。学习《说文》时,徐特立每天只学二三字,晚上睡不着或平时走路,就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中写来写去,以便熟记篆文写法。学习数学时,他常常把一本表解装在口袋里,走路时先翻看一条定理或者一个题目,然后边走路、边思索、边记忆,走完一段路程、掌握这个知识点之后,他就停下来翻看下一题。学习心理学、伦理学时,他先把术语抄在小本子上,然后放在口袋里,方便随时阅读。

除了“定量”,徐特立读书还遵循另一条原则,即“有恒”。徐特立坚持执行“十年破产读书”计划,到了第八年,他参加了科举考试,在初试3000多名考生中名列第19位,这使得他的名声和威望大为提高。随之,各处学堂争相聘请,许多学生慕名求教,他的年薪也涨到了60串钱。后来,徐特立回忆说:“我从20岁到30岁,面前摆着习科举和求学问的歧途,又摆着或破产购书,或守财不学这两个歧途,要我抉择。我最终抉择了其中之一,结果证明做对了。”这一时期,凭着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,徐特立博览经史子集等古籍,涉猎数理化学史地等近代自然科学书籍,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05年春,28岁的徐特立离开家乡,考入宁乡速成师范学校开始新的学习。毕业之后,他受聘至周氏女塾任教,以国文教学为主,兼教地理、历史、数学、化学等课程。经过几年的了解和观察,他发现了教育上的不少问题,尤其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小学教育问题很多。1910年2月,在朱剑凡的资助下,徐特立前往上海参加江苏教育会主办的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。学习结束后,徐特立由上海前往日本,考察日本小学教育。在日本期间,徐特立重点研读了日本教育学术研究会编写的《小学校事汇》《三

十个优良小学校》等著作,同时还进行实地参观考察。经过外出考察,徐特立感受到教育科学的重要性,思想上有了明显变化。回国后,他撰文介绍上海、日本的小学办学经验,推动小学教育改革工作,他认为:“实践第一、书本第二,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,可以不要,但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越多越好。”

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,徐特立针对学生读书贪多求快、不求甚解的毛病,提出了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的方法。他认为:“读书要守一个‘少’字诀,不怕书看得少,但必须看懂看透。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,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,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,要用一个本子摘抄书中精彩的地方。”他认为,用这种方法读书可以读一句算一句,读一本算一本,还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。毛泽东十分推崇老师的这种学习方法,读书期间做了好几网篮的读书笔记,包括听课、自学、摘抄的笔记,以及随感、日记等。

尽管声望和成就不断提高,徐特立却并未停下降求知若渴的脚步。这时,他的教书所得已十分可观,“在湖南高等师范教课,一点钟可得银洋三元,在湖南一师是一点钟一元”。丰厚的收入并不能解决思想上的困惑,黑暗的中国该往哪里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。他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。为了让劳动人民的孩子读得起书,他将“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学”,“一小部分用来帮助清贫学生”。1919年以前,长沙一共有800个小学校,而这些学校的教员基本上都是徐特立在短期内一手培训出来的。

五四运动爆发之后,看到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,徐特立认为“国家有前途、有办法,自己也觉得年轻了”。为了做一个“有学问的新人物”,他毅然决定赴法勤工俭学。有朋友劝他不要“到外国去做扶拐棍的学生”,徐特立说:“我今年43岁,不觉就到44、45,一混60岁来了。到了60岁,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,这17年,岂不冤枉过了日子?这17年做的事情,岂不全无进步了?到了60岁时来悔,那就更迟了,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?”

主意打定后,徐特立立刻开始行动。他在筹集差旅费后,回乡与妻儿告别,于1919年7月离开长沙前往上

海,等候轮船出国。同年9月,徐特立站在“英文只会拼音、法文一字不识”的情况下,离开祖国,前往法国勤工俭学。这期间,他还到德国、比利时考察教育,直到1924年7月回国。

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,徐特立参加了南昌起义,1928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在莫斯科读书期间,徐特立刻苦钻研俄文、马克思主义理论等。回国后,徐特立长期领导教育工作。1934年10月,57岁的徐特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。长征路上,他依然不忘教育工作,抓住各种机会,教授战士们学习文化。行军时,徐特立要求战士们在背包上、草帽上、斗笠上写上字,边走边教边学,而且每天只教一两个字,要求战士们先学会念,然后会写会用。有些战士嫌每天学得太少,徐特立耐心地说道:“一天学会一个字,一年就会365个字;学会两个字,一年会730个字”,“只要坚持,用不了半年,不但可以写标语口号,还能写信”。

延安时期,徐特立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,为了编辑出版历史、地理、数学、物理等教科书,他常常需要查阅大量资料,反复核证。担任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院长期间,为了使读书与大生产运动相结合,徐特立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、科研、经济“三位一体”的思想。他认为:“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,科学替生产服务,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。技术直接的和生产联系起来,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,才会成为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一部分。”同时,他还指出:“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,而经济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。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。”徐特立“三位一体”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一大批发明创造,有力地缓解了陕甘宁边区迫切的生产生活需要,也促进了困难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,徐特立依然保持革命年代的工作劲头和学习状态,“每天坚持8小时工作制,开会、作报告、写文章,忙个不停”,“孜孜不倦地批阅和草拟文件,翻阅的文件资料往往是几种以至数十种,严肃谨慎,一丝不苟”。为了鞭策自己,72岁的徐特立还制定了一个20年的学习与工作计划。虽然学识深厚,但他总是和以前一样虚怀若谷、废寝忘食,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从头学起的精神。在繁忙工作之余,他还挤出时间学习中共党史、中国古代史、民族史,研究语言和逻辑学等,还写下许多教育论文,论述马列主义教育理论,阐明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。

在其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中,不论从事什么工作,徐特立总是以一种兢兢业业的态度学习,从不满足和停顿。毛泽东赞扬他“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”,中共中央评价他“对自己是学而不厌”“对别人是诲人不倦”“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”。徐特立这种谦虚认真、勤勉好学、时不我待的读书精神,值得我辈永远学习。

(摘自2020年第12期《纵横》)

江善忠：死到阴间不反水

□ 马晓敏 黄英军



江西赣州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,是原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。在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上,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,以生命赴使命、用热血写忠诚,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。江善忠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江善忠,1906年出生在兴国县长冈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1928年参加农民协会,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历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,区、县、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等职。1934年10月,由于王明“左”倾错误领导,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,中央红军被迫长征。当时,组织上考虑到江善忠在当地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,决定将他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斗争。

江善忠坚决服从组织决定,将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机关进行改编,组成红军游击队,辗转坚持在兴国山区一带,与敌人展开游击斗争。“脚穿草鞋爬山峰,唔(不)怕雨来唔(不)怕风;唔(不)怕脑盖跌落地,只要革命早成功。”这是他经常用来鼓舞战友的一首言志小诗(兴国山歌),也是当年共产党人不畏艰难、不怕牺牲的真实写照。

1934年12月,江善忠奉命安置红军留下的一批伤病员。他潜回家乡长冈乡后,秘密联系了一批失散的革命同志,组织了一支十几人的游击队,利用夜色的掩护,将20多名伤病员集中转移到距兴国县城以东10多公里的山山猴哥寨隐蔽和治疗,自己则带着几名战士住在猴哥寨附近的另一个小山洞里,密切监视着县城方向的敌人。

然而,由于叛徒出卖,狡猾的敌人还是得到了消息,带领大批人马气势汹汹地向灵山“进剿”。江善忠临危不惧,一面率领游击队顽强阻击,一面派人通知伤病员迅速转移。敌人步步逼近,游击队的处境越来越险恶,如果不能及时突围,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此时,江善忠有两条路可以选择:一条路是退到猴哥寨与伤病员会合,伺机向深山转移,但由于伤病员太多,转移很难成功;另一条路是把敌人引向与猴哥寨相反方向的棒

槌峰,为伤病员转移赢得时间。棒槌峰因其形状很像当地妇女洗衣服用的棒槌而得名,是一座三面绝壁的孤峰,虽然易守难攻,却无法脱身。江善忠明知第二条路是条绝路,但为了掩护红军伤病员和战友们,他没有丝毫犹豫,边打边退,独自一人把敌人引向了山势险峻的棒槌峰。

在棒槌峰上,江善忠利用岩石作掩护,连续击毙七八个敌人。子弹打光了,他攀上山顶用石头往下砸,使敌人不敢再上前一步。很快,山顶上能搬动的石头也都用光了。敌人喊话要他投降,只要他说出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的下落,就可给他自由。身处绝境的江善忠,巍然屹立在悬崖边上,对敌人高声喊道:“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,胜利属于共产党!”随后纵身跳下百米高的悬崖,壮烈牺牲,年仅28岁。

第二天,敌人押着江善忠的妻子潘月英来到棒槌峰下,辨认江善忠的遗体。潘月英手捧丈夫的衣服,只见上面写着两行血字:“死到阴间不反水,保护共产党万万年!”江善忠用鲜血写下的誓言,铿锵有力、穿越时空,体现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诚忠心,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。

“脚穿草鞋爬山峰,唔(不)怕雨来唔(不)怕风。”正是千千万万像江善忠一样的革命先辈,凭着一心为民的人民情怀和清正廉洁的自身形象,坚持为人民打天下、为群众谋利益,得到劳苦大众的真心拥护,筑起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。学习江善忠烈士,就是要学习他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无私奉献的政治品格。

“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,胜利属于共产党!”江善忠在生死关头,义无反顾、临危不惧,敢于斗争、勇于牺牲,始终坚信正义事业必定胜利。学习江善忠烈士,就是要学习他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。

“死到阴间不反水,保护共产党万万年!”江善忠用鲜血和生命践行入党誓言,生动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。“对党忠诚”“永不叛党”,是无数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铮铮誓言,是每一名共产党员入党时所作的庄严承诺。学习江善忠烈士,就是要学习他忠贞不渝的革命信仰和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。

(摘自2021年第2期《党史文苑》)

“我们现在也有华佗，傅医生就是华佗”

□ 周 欢



傅连暉,1925年起在福建汀汀福音医院任院长。早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初,傅连暉就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。1927年,傅连暉冒着危险,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了“合组医院”,紧急救治南昌起义部队的300多名伤病员,所需药品全部由福音医院无偿供给。

1932年10月,毛泽东去福建汀汀看望刚生孩子的贺子珍并留下来养伤,被安排在福音医院休养,得到了院长傅连暉的精心治疗。次

年初,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“围剿”,毛泽东要回瑞金,傅连暉当即表示要跟着一起去瑞金。在毛泽东的倡导下,1933年初,傅连暉放弃了福音医院月薪400银元的丰厚待遇,毅然投身革命,来到了中央苏区,并将他历年积购的价值2000多元(上海时价)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捐献给了革命事业。

中央红色医院旧址展厅内的展板上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原校长钟有煌的一段话,记录了傅连暉当时“搬医院”的细节:“我去参观医院,首先看到的桌椅、板凳、病床、病房用具,又看到药品器械、诊疗仪器、药架、书架等,无一不是从汀州搬来的。可以说除了地皮、房子搬不动外,连手术室、诊疗室和药房的玻璃门窗、百叶窗都卸下一并搬到瑞金来了。”

中央红色医院成立后,因设备较为先进,医务人员水平较高,成为中央苏区规模最大、医疗水平最

高的医院。傅连暉医术精湛,救治过很多红军伤员,深得苏区军民信赖。毛泽东曾说:“我们现在也有华佗,傅医生就是华佗。”

除了承担医疗救治任务外,中央红色医院还开办了红军卫生学校,先后培养了686名医学人才。

从福建汀汀到江西瑞金,从福音医院到红色医院,以傅连暉为代表的一批中央苏区的“红色医生”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(摘自2021年1月28日《人民日报》)

瑞金总是给人以感动,给人以震撼。

一代领袖人物,无数英雄豪杰,怀揣着党的初心,肩负着民族的希望,在红土地上留下了一串串深深的足迹。

在以红都瑞金为中心的原中央苏区红土地上,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、求真务实、一心为民、清正廉洁、艰苦奋斗、争创一流、无私奉献为主要内涵的伟大苏区精神,撒播了薪火相传的红色火种,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。

“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”。苏区时期,仅24万人口的瑞金,竟有11.3万人参军参战,5万多人作为革命捐躯,其中1.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,瑞金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7166名——一组组数字,连缀起一个个前仆后继的身影,怎能不让人动容?凝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,我们分明看到的是:新生

的“人民共和国”,正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。

触摸红军烈士纪念馆的碑文,我们分明感受到的是:共和国大厦的基石,正是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血肉之躯铸就。

品一口沙洲坝的“红井”水,喝一碗赣南“无盐汤”,我们感受到的是党同人民群众风雨同舟、同甘共苦。

最后一碗米送给红军,最后一尺布送给红军,最后一块木板献给红军,最后一个儿子送去当红军——这些历经风雨、字迹斑驳的标语,背后原本就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,历久弥新。

循着先辈们的足迹,走进瑞金,感悟初心。

走进瑞金,就是走进了红色历史,走进了人民,更是走向了未来。“装点此关山,今朝更好看。”大柏地的枪声永不忘怀,历史的车轮已驶进新时代。

从红军广场到天安门广场,从红军烈士纪念馆到人民英雄纪念碑,从瑞金到北京——90年前的伟大预演,启示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。

红色基因需要一代一代赓续,英雄篇章正在一代一代书写。

热血依旧,砥砺前行。红都不朽,初心永恒。

(摘自2021年1月28日《人民日报》)

永远的红都

□ 郑少忠

